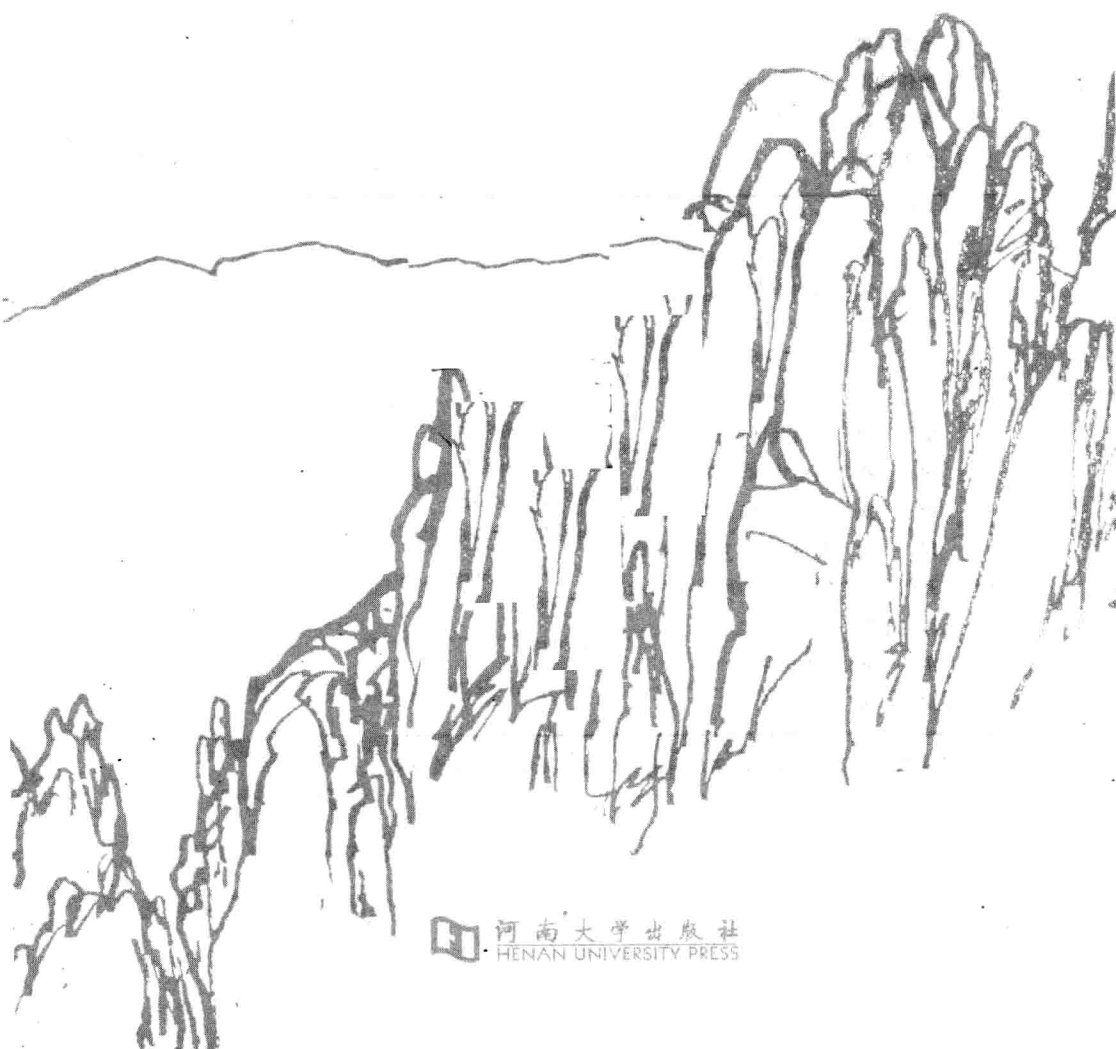


石齋語痕

吳福輝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斋语痕/吴福辉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649 - 1711 - 1

I. ①石…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513 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侯若愚 韩 琳
责任校对 韩 琳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9 室
电 话 0371 - 60993151 (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 - 86059753
网 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7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自序

本书是我近十年来所写学术散文的一个结集。是“语痕”，说得庄严一点，也是“生命之痕”。

我写这类短文，如果从青年时代给地方报刊投稿涂鸦，写那些零零散散的教育随笔算起，也已达半个世纪了。那时候似没有“学术散文”这一称呼，札记、评论（后来有一种小评论，实在是大批判，应不在此列）、小品（有科学小品）、笔记、读后感都是有的，因为鲁迅的关系“杂文”一语更是流行，像《门外谈》《上海文艺之一瞥》等说文论史，均可视为这类学术性杂文的典范。“学者散文”的概念也沿用过，特别是读了王了一先生（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对其十分仰慕。但那些散文偏不谈学术，而只谈战时生计，“学者”仅是作者的身份，并不是文学的身份，虽然字里行间骨子里仍不免透出书斋的底色来。这些年，才渐渐有了“学术散文”一语。我自己早年的几篇谈作家个性化的信纸信封、谈海派京派文化的各种浅陋文字，竟也被执行宽大主义的编者收入几种学术散文选集中去，不知不觉接受了这种文体，以至今日还有了这个专门的集子露面。

那么，何谓“学术散文”呢？我想套用唐弢先生他心中的“书话”应写成什么样子，来试着分辨阐释一下。唐先生以《晦庵书话》闻名于世。他的书话体，依我看具有浓烈的学术兼散文的色彩，所以他提出的要求是：“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序》）我自写这类文章，几乎一开始便遵循着这几个“一点”：大凡挖掘出零星的新材料了，有了些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了，但料子还不够做大衣长衫，写不成长篇论文的，便作成短文；追求文采却不允矫饰，笔调在松动些的论文和活泼不过分的散文之间。这即是学术散文。

回想刚开始写这类文字的时节，一般的环境多半是这样：在两次学术思考的间隙，在完成了一篇论文或一本论著需要喘口气的当儿，正巧有报刊编

辑约稿,恰好还有点边角余料,有点想法,于是用一天到两天时间涂抹成一篇小文,三四千字、五六千字不等,正是“瓮牖剩墨”(王了一语)的境地。这么说,并无轻佻之意。我说的是真实的写作状态,是学人文化休息的副产品。什么是“休息”?天天行走的挑夫,坐着便觉是歇着了;日日坐冷板凳的职员呢,当“驴友”钻山过河行走那才叫休息;通俗文学研究者看武侠肯定是正经工作,航天科学家或数学家读金庸方是养脑子。所以说,休憩状态写“学术散文”并不辱没学术和散文。我经常觉得专门的散文家要不得。散文家一旦端起散文架子,尤其是端起了“抒情”架子,咿咿呀呀不止,会让人受不了。最好是不以散文为专业的人一齐跨界来写:小说家写富有细节人间味的散文,诗人写带感情且带韵律的散文,戏剧家写人生纠结不开的散文。这其中,学者就应该保持他那饱满的书生气,有余暇便写点有知识有学问并有长短句的文字。开初不必当回事,可它自会生长,出苗挺茎抽叶,转眼间长成葱茏草木,有了独立的气候,这便是学术散文了。

2010年秋,河南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以全新的面目改版,编辑来找我开一个栏目,我拟了“石斋语痕”这个总题,正式开张,专意写起学术散文来。这里编入第一辑的,便是依时序排列的五年的全部栏目文章。第二辑是我参与写作以文学广告为核心的编年史的产物。第三辑是同时期所写的也符合这种规格的文字。我在这些年里长期尝试这种文体,认为选题不妨杂些,写法可采用材料阐释、笔记批注、实地考察、读书劄记、答读者问、名作重评等多种多样。现在的形式受材料的束缚,显得还不够开放,散文的味道也还不够醇厚。

在确定本书书名时,我顺理成章便采了“石斋语痕”四个字。这并无多少微言大义,仅是“写实”。不过是申明,自己是在一个摆满石块的书房里用功,“杭育杭育”留下了一点文字的痕迹罢了。我喜欢石头,因其坚实,同时不乏圆润,正合王瑶先生所持做人宜外圆内方之说。石头本身便显方圆二体,历来为中国文人珍爱,认为是精魂足可寄托之物。至于书房起名小石居,实在是寒舍狭仄,不堪负重,只宜在书案、台架、文橱上放置细微顽石,无须用厅堂院落来承载的意思。玩石头,最初是受老作家、老馆长李準的影响,跟着他到山东、河南看石;后来是每星期得闲到附近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去访石;现在则是每到一地无论国内国外,先要问石。家中则是凡能放石头的地方都已石满为患。于是坐拥石头城,读写我文学,此为我的幸运,岂有他哉。

说到运气,今日能将几年来的旧作在“学术散文”的名义下而集合,而出书,又逢我年龄上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也算其一吧。感谢师友们的正面相助,学生从旁给予刺激,引我在商业大潮下自顾自走我的学术之路。感谢河南大学文学院和《汉语言文学研究》杂志社同仁的支持,感谢河大出版社及我的责任编辑的辛劳,是你们多年如一日地给我以鼓励、鞭策,才使我有将拙文汇集起来的勇气!

现在的人,寿命大大延长了。我读过一本世界史,说这是地球的生态使然。人类对于这个生态现状负有责任,也享有成果。所以至今我还可以在这里饶舌。夕阳的年纪,总还存留着中年后期的生命感觉。但这种感觉不会被某种突然降临的力量所打断,也是不可测的。至少我要在这长长的文化休息时段里,将短文继续写下去。拿得动笔的时候就不嫌笔重,就不封笔。

吴福辉

2014年10月8日于京城小石居

目 录

自序	(1)
----------	-----

学余随笔

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的有限认同	(3)
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	(8)
抗战期间“文协”作家的重庆集聚地	(13)
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	(19)
“独尊写实主义”遭冷却之后	(24)
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	(29)
全景与杂陈	(34)
由野史材料探入“文学现场”	(39)
作家的多重身份	(45)
以广告为中心的文学编年史写作断想	(51)
熊佛西与河北定县的“农民戏剧实验”	(57)
左翼作家展露人性之作《丽莎的哀怨》	(64)
文学与历史	(70)
小说《四世同堂》和话剧《四世同堂》	(76)
张爱玲晚期作品《雷峰塔》《易经》《小团圆》讲读提要	(84)
沈从文网页词摘选	(92)
谈《雷雨》繁漪出场提示语的修改	(103)
海派话剧资料辑录及阅读笔记	(110)

广告断想

《创造周报》复刊骤止却引来《文化批判》	(121)
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	(127)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出版与 鲁迅等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译介	(132)
洪灵菲的《流亡》一度流行	(137)
被称为“扛鼎”之作的叶圣陶长篇《倪焕之》	(141)
冰心要求更正她关于普罗文学的谈话	(145)
《地泉》三部曲和五大序言的“清算”作用	(149)
从《现代儿童》看儿童文学的兴起	(154)
《灵凤小说集》及其他	(159)
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	(163)
读者热购《子夜》	(167)
丁玲失踪及长篇小说《母亲》的出版	(172)
叶圣陶谈《家》的典型性和成书过程	(176)
白薇戏剧集《打出幽灵塔》长久引人注目	(181)
蒲风诗集《茫茫夜》与中国诗歌会的创作	(186)
“大众语文论战”的始末	(191)
吴组缃处女集《西柳集》深得茅盾佳评	(195)
奴隶丛书与萧红的《生死场》	(199)
胡风渐露理论特质和锋芒	(204)
给各派作家具象的书简集	(209)

彗星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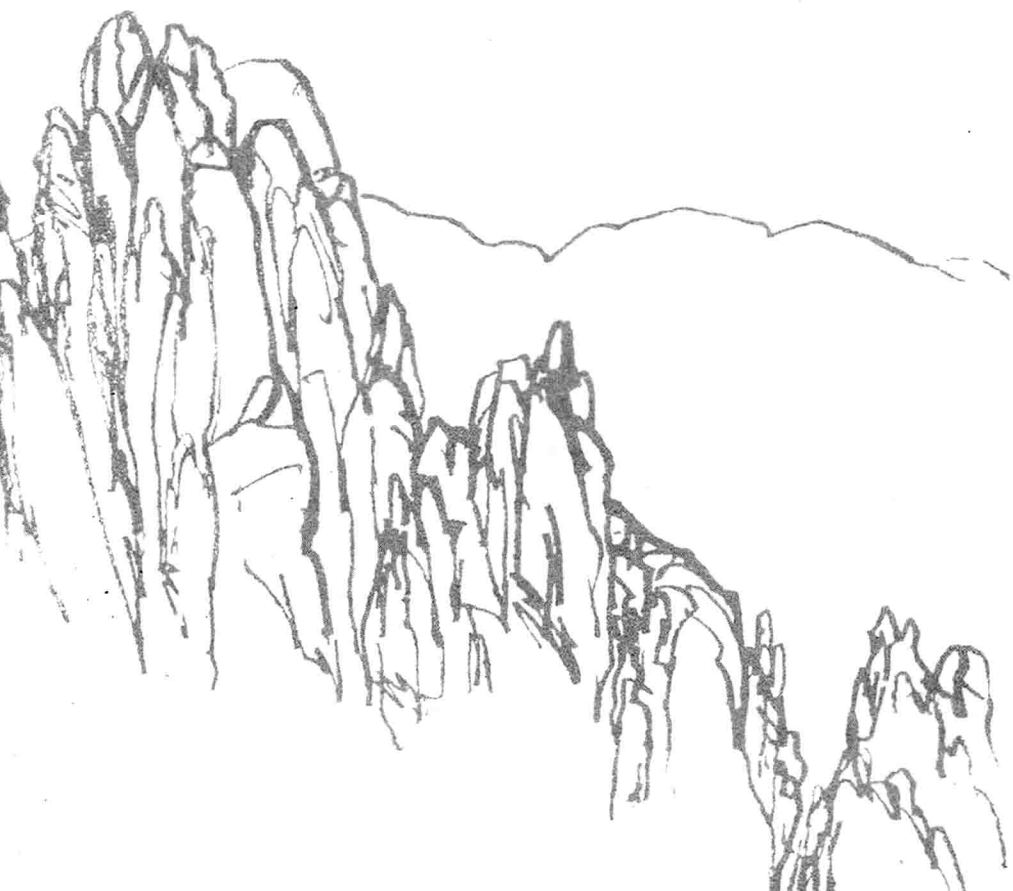
彗星随笔系列总序	(215)
沈从文文学生命的延续流转	(217)
由《龙须沟》想到老舍与市民的血肉关联	(222)

周瘦鹃的务新求变与现代市民文学接受史	(227)
丰子恺创作选本导言	(230)
施蛰存创作选本导言	(234)
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237)
莫言的“‘铸剑’笔意”	(240)
现代作家新编二题	(247)
为一个诚实生活的人画像	(255)
突破·调适·推进	(259)

长短新声

从留发、剪辫说到明日之学界	(271)
关于文学“转捩点”涵义的辨析	(276)
“抗战文艺”概念正在文学史中悄悄延展	(281)
“平津文坛”漫议	(286)
强调基本的语文材料和自主读写	(296)
为大学语文写的知识短文四则	(298)
我们这一拨儿人	(316)
给《丛刊》带来品格精魂	(323)
李欧梵的文学与都市:其书其人	(327)
弄堂深处是吾“家”	(330)
怀想王瑶先生	(336)

· 學余隨筆



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的有限认同

这是施蛰存先生 1982 年复我的一封信。快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由旧篋里翻检出来,好像从尘封里泻出一段“秋光”。此信给“海派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点历史、一点思考。信不长也不算太短,兹照录如下:

福辉同志:

1982,6,13

我去南京开了十多天会,昨日才回上海。见到你的信,迟复,甚歉。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你们决定选用《春阳》,很有眼力。这篇也是我自己满意的。在二三十年代,我们家乡小城市里,这样的女性不少,我写这一篇,是有现实模特儿的。你们选用这一篇是否可以加一篇分析批判,故事的社会背景,恐怕今天的青年知道了。

你提的四个问题,简复如下:

(1)二三十年代,精神分析学说是盛行时代,许多人都有机会看到有关书刊,无论中文外文。我能看英文本,所以曾买过一些英译本看。蔼里斯的“性心理研究”全书六大本,我也有,但没有完全看。此书到 1962 年才卖掉。

(2)我的中间一段时期的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可以说与穆、刘有共同处,但与徐訏似乎不同。

(3)“新感觉派”是三十年代初期在日本盛行的创作流派,我和刘、穆都受到一些影响。楼适夷同志熟悉日本现代文学,他大约当时也多看这一派的作品,因此他把我列入新感觉派。我不反对,不否认,但觉得我和日本的新感觉派还有些不同。因为我写的还是以封建社会小市民为主,而日本的新感觉派所写的是资本主义大都市里的男男女女。

(4)我只知道上海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姓应的在搜集我的资料。他来过,我叫他不要直接向本人找材料,我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事。

刚回家,有许多事,无暇详述,以后再谈。

祝健安

施蛰存顿首

捷克有一个人叫迦列克,发表过一篇文章,讲了三个中国作家,茅盾、曹

禺和我。此文我未及过目,听说发表在“诺贝尔奖金文学论文集”内。

又及

以后来信,请附详细地址。此信不知能及早收到不?

此信在格式上的特殊之处,一是在信纸右上角用橡皮图章盖了“年,月,日”的时间,而在信的落款处反倒不署了。据我看大概是昔日上海生活留给沪地市民的一种洋派习惯,与穷富贵贱无关,因为我见过丁景唐先生的信函上也有类似的图章用法。二是结尾用了草书的“顿首”,令我有点像中学读《两地书》时吃惊于鲁迅称自己的学生为“广平兄”的感觉。此信的内容相当集中,是回答我研究他、研究海派的一些问题的。

我大概在1979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对施蛰存开始发生兴趣。起因是读了他三个小说旧集子:《上元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刚读《上元灯》那会儿(记得封面的“灯”字印作“镫”),只是觉得写少男少女心理写得可爱、细微,微得如牛毛一般。等到看到后两本书,则大惊异,心里说这不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吗?

时值1981年春,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念起来刚刚有点顺口,《十月》的资深编辑黎汀先认识了凌宇,然后经过凌宇来约我们同学写稿子。我至今还感谢并佩服黎汀,她那么一位瘦骨嶙峋、文雅至极的女性怎么会有如此的魄力,敢在全国上下心有余悸的年代,约我们这些在校的研究生为全国声名赫赫的大刊物写作?而且她的要求很特别,要我们写的一定是过去被忽略的作家,介绍的一定是普遍陌生却在艺术上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介绍的办法也颇有讲究,是将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评论置于前,作为正文;而把现在看来都是大作家的传世之作稍稍擦去点灰土便附在后面。这是时代带来的做法,此前此后都不可能出现。所以施先生在并不知道我们准备如何介绍他的前提下,会在信里提出“你们选用这一篇是否可以加一篇分析批判”,也正是此意。那是个向前大力突破、却又必须留意身后的年代,就像一个球队每次进攻时都要准备好防守,否则一不小心就让人抄了后路了。当年的《十月》何其了得,但它也不能不小心。它虽然只是北京的一个市级出版机构办的大型文学杂志,但多年站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立场上,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上海巴金编的《收获》三足鼎立,影响远播全国。记得与我的评论登在同期的,还有《沉重的翅膀》《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等现在流行叫“重磅出击”的作品。而《沉重的翅膀》在得茅盾长

篇奖时有一约定,是必须作一定修改。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开始了我的左翼外的文学研究(我研究过张天翼、沙汀等左翼内的作家,直到今日我还是内外都在研究,没有边界):我给《十月》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钱钟书,介绍的小说是当时谁也不知道的《猫》;第二篇写的就是施蛰存,选定的作品即信中提及的《春阳》。

我选定《春阳》为施蛰存的代表性作品,当时毫无依傍,完全是自己大胆认定的。查施蛰存的自述,仅1933年前写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一篇,谈的都是前期作品,当时《春阳》还未出世。谁研究过施蛰存呢?文学史已经将这位作者隐去很久了,仅王瑶先生以他开阔的眼界,在1957年“反右”前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把施蛰存收入了其文学视野。那本书的第八章第七节“历史小说”里谈到施蛰存“用力于佛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①,短短一句已是石破天惊。但所列小说仅有《石秀》《将军底头》《鸠摩罗什》《阿槛公主》,收在《善女人行品》里的《春阳》却被文学史遮蔽了。而我选《春阳》,与施先生在此信中的肯定,表面看来相同,其实两人的理由在当年也是各异的。《春阳》写的是春光明媚的上海南京路,这日竟使年轻时为了财产抱着牌位结亲的邻县富婆婢阿姨的潜伏心思大动,她将银行男职员彬彬有礼当作是含情脉脉,她要不亏待自己地消费一下、解放一下,但瞬息就发现这不过是个幻象,于是她很快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自己。我之所以看中这篇《春阳》,而不选施的《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这样的纯心理分析小说,是因后者只不过是一种新鲜的现代主义引进,只不过是新感觉派里的刘呐鸥、穆时英们用心理流动、意识流动来描写大都市抽象人性的试验品而已;而《春阳》这样的稍后作品,描写困境中的女性照样用得上纯熟的精神分析笔触,但又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紧紧结合,密不可分!正是侧重于施蛰存在《春阳》《鸥》《狮子座流星》这些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推进力度,我才选择了它,才会拟出我第一篇研究施蛰存的论文题目:《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1991年收入我的集子《带着枷锁的笑》时改为《中国弗洛伊德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而施先生自己在信中向我强调的《春阳》的重要性,着重在题材、人物:“这篇也是我自己满意的。在二三十年代,我们家乡小城市里,这样的女性不少,我写这篇,是有现实模特儿的。”对于施蛰存的这句话,我们只要联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298页。

系此信后面谈到他与日本新感觉派的不同(实际也是与文友刘呐鸥、穆时英的不同),就可感到他的用心,是有意无意地在突出自己与“新感觉派”的相异之处。

“新感觉派”的帽子最早是楼适夷给施蛰存戴上的。这见于1931年10月26日《文艺新闻》第33号,当时楼适夷的文章就叫《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此文从“法国最流行的 Surrealism”(超现实主义)和日本“新感觉主义文学”的影响角度,指出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无疑地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新的展开,这样意识地重视着形式的作品,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并不曾于创作文学里见到过”,“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我们只要知道楼适夷的权威性评价这么多年悬于施氏的头上,就可体会到当我问及施先生现在你对这篇评论如何看待,承不承认自己是“新感觉派”的时候,他回答的语式是多么奇特,多么的不一般了。施先生在信中说:“楼适夷同志熟悉日本现代文学,他大约当时也多看这一派的作品,因此他把我列入新感觉派。我不反对,不否认。”在连说两个“不”字后,他接着又说:“但觉得我和日本的新感觉派还有些不同。”

这种表面上认了自己的“新感觉派”属性,然后即刻就谈“不同”的那点意思,在全信几乎贯穿始终,其中至少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他承认自己有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但主要不是如刘呐鸥、穆时英那样阅读、翻译日本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的作品,而是直接接受弗洛伊德和蔼理斯学说的影响。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二三十年代,精神分析学说是盛行时代,许多人都有机会看到有关书刊,无论中文外文。我能看英文本,所以曾买过一些英译本看。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全书六大本,我也有,但没有完全看。此书到1962年才卖掉。”在写这封信的前三个月,他还说过:“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 Freud 和 H. Ellis 的影响为多”(施蛰存1982年3月2日致笔者信)。所谓受弗洛伊德、蔼理斯学说的影响是源,在精神分析学说笼罩下产生的日本新感觉派则是“二传手”,是源下之流。施蛰存把自己与现代主义的渊源,讲得十分明白,因而与日本“新感觉派”就会若即若离。第二,施蛰存认为自己的小说虽大部有“心理分析”的倾向,但“心理分析”不完全等于“新感觉”,从创作时间上看也有所分割,真正属于“新感觉派”的时间并不很长。在信中他明确地说:“我的中间一段时期的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可以说与穆、刘有共同处。”那么“中间一段时期”以外呢?就与穆时英、刘呐鸥不同

了。按照我的看法,他总共创作的9部小说和小说集,可分为三段:《江干集》《追》《上元灯》《绢子姑娘》《李师师》自费出版于1923年至1931年;《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出版于1932年至1933年;《善女人行品》《小珍集》出版于1933年至1936年。真正的“新感觉派”时期便是“中间”这两年。前面的时期远不是“新感觉”,从1933年出版的《善女人行品》开始明显透露出过渡状态(《春阳》便是过渡的产物),然后两年没有出版小说,直到1936年出《小珍集》完成了过渡,终于从“新感觉”中蜕化出来。第三,为什么施蛰存能够蜕变,而刘呐鸥、穆时英不能?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根基相异。刘呐鸥是台湾人却成长于日本,求学于日本,对东京有感觉;穆时英是浙江人,在上海长大,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对上海有感觉。而施蛰存踏上社会后虽长期寓居上海滩,但他幼年在苏州生活,中小学在松江读书,大学一度考入杭州之江大学,而且在离沪地不远的松江县,还有他父亲的宅院和产业,他经常招上海文坛的朋友到松江聚会。所以他的作品并非只有上海的戏院、跳舞厅、饭店、影院、商店,也有许多乡间景象,更有“乡下人进城”的描写(如《春阳》)。他在信中阐述他与日本“新感觉派”的不同,就直接指出“新感觉”的大都会性质,而自己却有许多小城、小市镇的文学经验,说“因为我写的还是以封建社会小市民为主,而日本的新感觉派所写的是资本主义大都市里的男男女女”。

施蛰存在这封信里将他与“新感觉派”关系的有限性,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我受此信启发,随后开始了我长达十多年的海派文学研究,1989年发表了《为海派文学正名》和《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两篇论文,1995年出版了《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在我的海派研究中,我始终注意着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作家与其他“新感觉派”的区别,注意海派作家之间的区别,同时反向思考海派与京派、海派与左翼之间拉扯不断的联系。这种套路也适用于研究“京派”内部、“左联”内部、“通俗文学”内部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全体。因为这是一条文学史的通则。

2010年8月12日于小石居

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

谈起“费孝通和文学”这个大题目,对于我来说,首先想到的不是费先生写过的散文、旧体诗,虽然他在这方面的创作也不俗,也很有特色。我更真切感受到的,是他那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鲜活而扎实可信的社会学成就,它足能切切实实启发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社会学与文学,本来一个是在社会科学门类里面,一个是在艺术门类里面,两者好像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论及“文学研究”,那即是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相互间就有了关联,就有了一个“文化”的共同项了。在理论上侈谈两者的关系自然非本文主旨所在,我对费先生的社会学或许也只能有点皮毛的实用性的领会,不过,我现在所谈的话题应是从我自身出发来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最好方式,因为我要说的话至少是亲切的,由衷的。

我的这个想法并不是现在才冷不丁地产生。大约 1979 年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读到了费先生 1948 年出版的两本篇幅不大的社会学旧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其时,我刚刚进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佳境,探寻的目标正围绕着学位论文所涉及的新领域“京派作家作品”进行。京派是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在左翼文学之外,于中国北方形成的一个作家群体,一向为我们偏狭的文学史眼光所忽略。而实际上,它所拥有的作家包括沈从文、废名(冯文炳)、芦焚(师陀)、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汪曾祺、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李健吾、朱光潜等,不仅阵容壮大,文学实绩也很可观。研究京派文学给我带来的绝大挑战,便是连京派是否存在、如何界定、包括哪些人物、有些什么特征都需一一从头做起,加以确认。那时,我心里的未知数真不少,比如当时集聚在北平(京)这个城市里写作的京派作家们,为何大部都是长江流域的南方籍人氏?京派作家主要是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师生,是典型的学院派,为何所写都是偏僻乡村的风土人情?其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学篇章,不外沈从文的湘西沅水流域的边城,废名的湖北黄梅和京郊的湖光山色,芦焚的中原衰颓的果园城世界,汪曾祺的苏北高邮一带的乡镇风俗民情。他们的叙事作品为何不以栖身的北平(京)为主要表现对象,反倒厌弃现代都市,甚至有人一辈子以“乡下人”